

O

柯军

昆曲印

我与篆刻结缘，始于上世纪 80 年代，至今已逾四十年。当初戏校才毕业，刚刚与隐雷谈恋爱，岳父见过面之后让内子传话，“人不错，字不好。”一句话激发了我学书法的热情，就跟戏校的冯怀根老师学习书法篆刻。那时昆曲处境低迷，年轻演员工资也很低，我跟着冯老师一度在南京涉外酒店设篆刻摊位，常常开夜车为外宾赶刻印章，收入可观贴补家用，是我当时学篆刻的强大动力。

让我真正爱上篆刻、钻研篆刻的，是昆曲大师张继青老师。张老师要去台湾讲学，托我为台湾的昆曲泰斗曾永义先生治印，她说，这既是别致的礼品，为台湾朋友所喜爱，也是展示大陆青年一代昆曲演员的综合艺术修养。这是我学习篆刻以来首次获得的殊荣。从那以后，我努力寻找机会向著名篆刻家请教。我曾带着印谱登门向马士达先生求教，得到马老师的倾心指导。也曾向庄天明先生请教，庄老师既善于启发、引导，又高标准、严要求。记得向黄惇先生请教，我自认为刻得很好很美很有感觉的印，在黄老师眼里是“这个印坏了”；我自认为大胆敲击、使印有残破之美，黄老师却认为“这个印没办法修复了”；我自认为刻出了戏词心碎的感觉，可是黄老师却说“刻得太碎了，好看吗？”黄老师还鼓励我，不要满足于做业余刻印的“票友”，要努力达到专业篆刻家的水准。这些篆刻大家的教导和鞭策，使我沉浸于篆刻艺术的研究和创作之中，起早贪黑乐此不疲。

这期间，我也拿着印谱向文学界、书界、美术界的名家们请教。文艺界名家们因我是个昆曲演员，不免另眼相待，自然会说“不简单！不简单！”，并且在我的印谱上题写嘉许之词，给予我鼓励。我心想，自己刻了三十多年的印了，刻得还不错，再加上有这些金灿灿、光闪闪名家的加持，或许该出一本印集了。征求老友辛尘先生的意见，他却给我泼冷水：“你是昆曲‘梅花奖’演员，如果真要‘跨界’，就不能拿业余水平的东西到别的艺术门类凑热闹。你必须创作出经得起专家审视、时代检验的篆刻作品，出版印谱才能对得起篆刻艺术，才能传得下去。”他也不赞成我当时对个人印风追求的方式，说：“戏曲演员创造个人风格不能靠喝醉酒上台表演，篆刻创作者同样不能以横冲直撞地乱刻作为自己的篆刻风格。篆刻

组织授予的“人类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对我来说这的确是个金点子，作为昆曲人，我有责任借助于自己熟悉的篆刻艺术来宣传昆曲、弘扬昆曲；作为篆刻人，我应该充分利用自己积累的昆曲修养来创作篆刻、寻求突破。我意识到，这将会是我独特的“印外求印”，是一名昆曲演员在篆刻艺术创作上最好的发展方向。

如何把昆曲与篆刻融合在一起，是一个非常有趣、也值得深入探究的课题。昆曲里蕴含着极为丰富的篆刻创作印文素材，字数少的有戏名、曲牌、经典作家名、杰出演员名，字数多的则有大量脍炙人口的唱词。是以固定的篆刻风格来刻千变万化的昆曲素材，还是以千变万化的篆刻形式来表现昆曲素材的不同意趣？我选择的是后者。且不说我的篆刻现在还没有形成经得起推敲的个人风格，即使是个人印风很成熟、很完善，用来表现不同风格、不同情境的昆曲题材也是不合适的。这就如同昆曲表演有生、旦、净、末、丑五个行当的二十家门，不能单以一个行当来表现二十个不同的家门；昆曲填词制谱分南曲与北曲上千种曲牌，单以一个曲牌的风格来表现千差万别的剧情、情境，显然是不合适的。我是要篆刻形式的可变性来表现昆曲艺术的丰富性，而不是随便拿一些昆曲方面的文词来表现我的个人印风，这与辛尘先生提出的“印出情境”不谋而合。

为此，我把可以用作篆刻创作的昆曲题材分为两大类，昆曲文学（包括戏名

和唱词）和昆曲音乐（主要是曲牌），琢磨各个剧目所表现的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情境，体验经典唱词所传达的不同景象、不同情感、不同意境，咀嚼南北曲牌所呈现的不同美感、不同情绪、不同风格，以自己在昆曲艺术表演和教学研究中长期积累的“印外修养”，来激发自己的篆刻创作灵感，引导、运用“印内功夫”，努力寻找古代的不同印式及其风格与昆曲气象的相通之处，谋求把昆曲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人文精神融入印稿设计之中，把昆曲的文学之美、剧情的悲欢离合、人物的喜怒哀乐、唱腔的高亢低婉，一一转化到印面上。

简约而深刻，写意而克制，是昆曲的美学特质和艺术品格。用昆曲独特的情境激发篆刻奇特的构思，寻求昆曲与篆刻相融，将是我毕生追求和实践的“印从昆出，以印铭昆”。在这一艰苦的探索中我真切体会到，要做好这样的实验性创作，不仅要具有全面的印学素养、深厚的篆刻功底，还必须具有广博的文史知识、渊雅的艺术才思。必须站在艺术之巅峰篆刻，以审美通感突破昆曲与篆刻之间的壁垒，才能创作出一方方构思独特、富有昆曲内蕴的篆刻艺术作品，创造出气息醇正、意蕴深厚的“昆曲印”。我把自己近两年的习作与点点滴滴的创作体会整理出来，奉献给昆曲艺术和越来越多的昆曲爱好者，就教于篆刻界的老师和朋友们。

（作者系昆曲表演艺术家，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戏剧家协会主席、江苏省演艺集团总经理）



民艺的边界：再读张道一《中国民艺学发想》

O

唐鹏

在第十五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颁奖典礼上，作为中国民艺学的倡导者和主要创建者，张道一先生被授予中国文联终身成就民间文艺家荣誉称号。早在 1988 年先生就发表了《中国民艺学发想》，最早使用并辨析了“民艺”一词的概念，全面系统地提出民艺学科的建设问题。今天，自《中国民艺学发想》发表已过去 30 多年，中国社会和民艺的生存土壤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民艺的内涵与外延也逐渐变化和扩展，然其当年的思考和构想依然对当下的民艺发展有着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再读此文，我们依然可以从中获得启发。

文章从民艺一词的来源与训诂谈起，对民艺、民具、民俗、民间艺术、民间美术、民间工艺等概念及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辨析，提倡从全面调查、分头研究、观察趋向、预测未来几方面着重解决民艺学的研究宗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民间艺术的分类和成就等问题，并进行了深入分析。在研究方法上，先生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在今天看来依旧具有实践价值的路径，他提出研究民艺学应建立起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不一定先从定义出发，同时要突出中国特色。民艺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发展迅速，当下民艺的传承与创新、形式与内容、创作与传播无不见证着文中“今后 20 年”的变化，可能会大于以往的 2000 年”这句话的预测。正因如此，我们应以发展的眼光看待民艺，并重新审视民艺的边界。

“民艺”一词由“民”和“艺”组成，本身可做多种阐释。文中将“民”释为“民

间”、“民众”、“平民”，将“艺”释为“艺术”、“技艺”、“工艺”。中国民协主席潘鲁生在其著作《民艺学论纲》中又将“民”释为“人民”，将“艺”释为“手工艺”。从潘鲁生、杭间、邓福星、邱春林等民艺学家的文论中可看到将“民艺”理解为“民间艺术”、“民间工艺”、“民间手工艺”、“民间美术”等。沿着不一定先从定义出发的路径，或许就不用急着把各种概念一一辨析，民艺的这种模糊性和多元性似乎是与生俱来。换一个角度，“民”和“艺”所代表的是一种发散的概念群，本身具有多重解释，而当以这种视角来看待民艺时，那些辨析不清的概念将共同成为扩大民艺边界的元素与动因。

“民”字针对群体，包括创作主体、受众与传播群体的限定。一般而言，在古代相对于宫廷、文人士大夫和宗教，在现代区别于专业艺术家。但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原先带有阶级意味的民间概念和群体早已发生嬗变，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专业艺术家加入到传统民间工艺的传承创新中，另一方面是大量来自乡村的新一代民间文艺工作者已逐渐脱离乡土属性，朝向专业化方向发展，加之城市居民对民艺接受度和消费能力的提升，让这一过程持续进行。此时，“民”作“人民”理解已成应有之义，并逐渐演变成“大民间”的范畴，民艺参与群体的边界不断被打破。

“艺”字针对内涵属性，主要包含艺术和工艺两方面，艺术偏向于欣赏性的精神文化，工艺则偏重于实用性的物质文化。中国古代长期“重道轻器”，视工艺为“小道”，甚至在当下依然存有这样的倾向，给工艺带来了不公平待遇，阻碍了其发展。先生在文中指出，人类最初的造物活动是

从实用开始的，工艺文化始终带有综合性

和本元性，当下，精神的和物质的文化又在走向新的综合。王朝闻在《适用超实用》一文中以素陶造型的美举例指出艺术和工艺、审美和实用或许是相互作用于对方，既可能是实用创造了美感，也可能是特定的精神需要让人们在设计素陶时让审美意识对象化、物质化。早在春秋末年我国第一部工艺著作《考工记》中，就已提出了“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的造物思想，体现出“天人合一”的文化精神，将“道”和“器”统一起来。艺术和工本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存在高下，只有突破这种认知的边界，才能进一步扩展民艺的边界。

先生在文中没有过多谈及民艺传播方面的内容，这与当时的科技水平和民艺是由广大民众自己创造、自己享用的特征有关。在今天，对民艺传播方面的研究则显得格外重要，只有通过大众可以接触到的、有效的传播途径和形式，才能不断扩民艺受众的边界。在实物传播层面，需加强对线下展览和消费领域的研究；在数字化传播上，应充分发挥各类媒体、短视频平台以及数字媒体技术的优势。

先生的《中国民艺学发想》阐述了当年他对于民艺现状的思考和对其未来的预测。他在文章结尾说到“遥远的未来是个什么样儿，我们无法估计，但是，今天的研究如果不预想未来 10 年、20 年，将会变得近视”，这或许是文章带给我们的最大启迪。过去的 30 年，民艺领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站在更高的起点，我们依然需要像先生说的那样对未来 10 年、20 年做出预想，并不断探索民艺的边界。

（作者系中国民协会员、江苏省评协会员、江苏省民协驻会干部）

一元钱的心愿

O

魏霞

临街，门口立着个老式的烧饼炉子，几张木头桌子和若干塑料凳子，卖包子、烧饼、小米粥和胡辣汤。四年了，这个没有名字的早餐店，曾数次在我的脑海里起起伏伏地出现。

掀起时光隧道的门帘，走回四年前。2019 年秋，到支教的学校报到后的第二天，因学生未正式开学，校食堂早上没饭，一早我沿街去找早餐店。“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出校门没多远，就碰见同去支教的一位男老师吃早餐回来，他手中拎着的塑料袋里装着三根油条，非让我吃，说是时间长就不好吃了。盛情难却，我欣然接受。于是，我拎着三根油条进了一家早餐店。

一碗黏糊糊的小米粥，一小碟子细脆的萝卜丝和三根油条，成了我的一顿早餐。

“多少钱？”

“小米粥一元，萝卜丝不要钱。”

我起身扫码支付。可不知何故，任凭我翻来覆去扫桌子上的二维码，就是扫不上。

“明天我来吃早餐，再付，可以吗？”我有些尴尬，生平还没有拖欠饭钱的先例。

“卖了这顿，我们暂停营业，中秋节前娶儿媳妇，至少一星期后才能回来，你什么时候再来再说吧。”女老板一边收拾碗筷一边说。

“一块钱，算了不要了！”烧饼炉前的男老板豪爽地说。

“那怎么能行？等你们再营业我再来。”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祸兮旦福。两天后，突如其来的一场大病，迫使我离开了那个离家三百多里的小镇。

一晃就是四年。四年内我曾托人帮我去寻那家早餐店，被托的人不是不屑，就是说小镇有两三家卖早点的，搞不清是哪家。偿还一元钱的心愿终未实现。

有时候想想自己也许有些小题大做。不就是区区一元钱吗？是不是还有人一元硬币掉在地上懒得弯腰去拾吗？可不还上那一元的小米粥钱，心里总觉得疙疙瘩瘩不舒服。

去年秋天，又外出支教。因心中牵挂着要偿还的一元钱，我期望能分到那个曾经的镇，谁知却分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好在二者相距不足四十里，不算太远。

一开学，忙，后来又因疫情放假，新年后再开学还是忙，一元钱的心愿被一拖再拖。直到前一段时间，眼看距离支教结束的日子越来越近，偿还一元钱的念头越来越强烈——记忆的行囊不能再背了，越背越沉。

一天刚麻亮，我开了手机导航，骑上借来的电动车，向曾经的小镇奔去。

小镇不比四年前繁华，凭着记忆，我沿街寻找。印象中是在十字路口路北，可我来来回回走了两三趟，硬是找不到一家早餐店。路南倒是有一家，进去一攀谈，不是。忽然，我眼前一亮——“家乐超市”，似乎我念念不忘的那个早餐店就挨着家乐超市。我忙问身边的一位大姐，紧挨着家乐超市的那家早餐店怎么不见了。

“原来家乐超市旁边有两家早餐店，一个关门不干了，一个换地方了，你问的是哪家？”

两家？这我并不清楚。

“四年前的中秋节前娶儿媳妇的那家。”

“四年前……娶儿媳妇？”大姐皱眉思索，忽又展眉道：“你去西边桥头问问，是不是那家？”

四年前我并没有刻意去记早餐店男女老板的容貌，因为那时我笃定不久就能偿还那一元的小米粥钱。

“你好！四年前，你家中秋节前娶儿媳妇了吗？”我搭讪着笑问女老板。

“娶了。咋了？”

“我在你家店里喝了一碗小米粥，还没有给钱。”

“你是老师？”

“嗯。”我记得我当时告诉女老板，我是老师，以表自己不是蹭饭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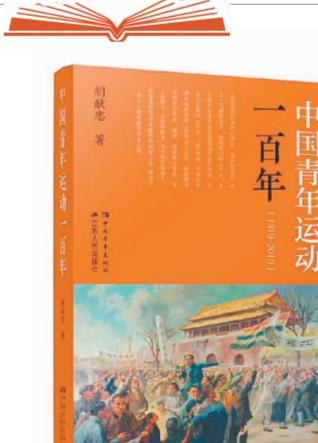
“呀！”她挓挲着两只面手，有些吃惊，“这都四年了，不要了，不要了。”

“哪能呢，当初一元，现在翻倍。”我掏出手机扫码，伴随着“滴”的一声扫码成功，我的身心一阵轻松。

……

有时候，促使人必须要去完成的一件事或一桩心愿，关乎到诚信与信誉，和钱的多少无关。

繁荣书单



胡献忠著
2022年4月
江苏人民出版社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中国青年运动一百年(1919-2019)》

简介：本书以 1919 年五四运动为起点，记述百年来中国青年围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的历史主线，包含时代背景、党的领导、团的组织、青年参与、逻辑分析五个方面的内容，生动展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青年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前赴后继的奋斗历程，探讨中国青年运动由自发到自觉的客观必然性，揭示青年与国家、青年与社会互动关系的生成与演进。本书入围 2022 年度“中国好书”。